

整风学习参攷材料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印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

新生事物一定要胜利

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止嗎？这是不可能的。承認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認全部历史經驗。……只有后一种假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匱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惡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則才能实现。……那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則的实现而告終：別的可能性是不会有有的。

（恩格斯：“在受北斐特的演說”，一八四五年。“馬恩全集”第二卷第六二四——六二五頁）

共产党人認為隱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声言：他們的目的只有用強力推翻全部現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頸上的一条鎖鏈。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四一頁）

馬克思完全相信“宣言”上所提出的那些原則終究会获得胜利，他完全信賴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討論必定会使工人階級的智慧发展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們在巴黎革命，即在无产階級帶着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第一次革命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一八六

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多數西歐國家中的無產者已經聯合成為流芳百世的國際工人協會了。固然，國際本身只存在過九年之久。但它所創立的全世界無產者永久的聯合依然存在，並且比先前任何時候更加堅固，而今天這個日子就是最好不過的證明。因為今天我寫這個序言的時候，歐美兩洲無產階級正在檢閱着自己的戰鬥力量，它們第一次在一個旗幟下動員成為一個軍隊，以求達到一個最近的目的，即在法律上確立早已由國際一八六六年日內瓦代表大會宣布，爾後又經一八八九年巴黎工人國際代表大會再度宣布過的八小時標準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會使全世界資本家和地主們知道：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真正已經聯合起來了。

呵，如果馬克思今天還能同我站在一起親眼看見這種情景的話！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九〇年德文版序。“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六——七頁）

當（約十年前）巴黎公社在遭到“秩序”的擁護者製造的野蠻屠殺而被鎮壓時，勝利者決沒有想到，為時尚未十年，在遙遠的彼得堡就在發生這樣一個事件，它經過鬥爭（可能是長期而殘酷的鬥爭）後結果必將建立俄國的公社。

他們決沒有想到，包圍巴黎而迫使當權的資產階級去武裝人民，從而準備了公社的普魯士國王，他本身過了十年竟被社會主義者圍困在自己的首都，只有宣布自己本國的首都柏林處於戒嚴狀態才能保持自己的王位。

.....

總之，舊世界列強認為已被掃除的公社現在是空前地強大，所以我們可以和你們一起高呼：Vive la commune！（公社萬歲！）

（馬克思、恩格斯：“致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為紀念巴黎公社周年而舉行的斯拉夫人的群眾大會”，一八八一年。“馬恩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十五卷第五五二——五五三頁。）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們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們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情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們的。胜利一定是他們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一九一七年。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七七頁。）

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們的，因此我們可以（而且应当）在偉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計結合起来，即冷静地清醒地估計到资产阶级的瘋狂掙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扑灭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国布尔什维克被击败了；一万五千多德国共产党人，被謝德曼和諾斯克协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將軍們用欺詐的阴谋詭計和挑撥手段杀害了；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正在肆无忌惮地橫行着。然而無論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經受鍛炼和日益发展着；它已經如此根深蒂固，摧殘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頓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八十三頁。）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說，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敗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說，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漸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敗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

階級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為生活中的累贅。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九〇六年。“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五頁。）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这点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个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机械地規定时日。但我所說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沒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远看东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嬰兒。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一二頁。）

共产主义是无产階級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別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館的东西了。資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館（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进博物館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一九四〇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七九頁。）

我們宣傳大会的路綫，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鋒队覺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爭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

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奋斗，去爭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两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領他的儿子們要用鋤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說是你們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小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們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們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〇一——二〇二頁）

中国人民将会看見，中国的命运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創伤，建設起一个嶄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會議筹备会上的講辞”，一九四九年。）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农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干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戶貧农所表

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終归是要走这三户貧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一頁）

社会主义制度終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將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个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們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結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为了偉大的俄国革命和偉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嗎？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

新生事物的成长一定要經過斗争

偉大的俄国革命家卓尔尼雪夫斯基說过：历史活动不是湮灭大街的人行道。誰認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風順；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証，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寬闊、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暫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圍困在碉堡內”，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狹、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險的山間小道，誰認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沒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迂腐气，誰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流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陣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以及（虽然少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宁：“給美国工人的信”，一九一八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

四九頁。)

在我們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輕易地死去，它們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們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輕易地生长起来的，它們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間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間的斗争，——这就是我們发展的基础。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八三——二八四、三二〇頁。)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內，是那样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內，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贊成新事物，

(毛泽东：“他們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三七頁。)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經過这样的一場斗争，就不能創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們的头脑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經過許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

(毛泽东：“严重的教訓”一文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第二五五頁。)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誕生，总是要伴随一場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靜的情况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产党人向着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

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七〇六页。）

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社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他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

（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七七八页。）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

必须坚决保护新生事物，不要怕它有缺点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

束，这样，把人弄死以求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应该是最合情理的了。至少辯論人在企图扼杀出版自由的时候是这样推断的。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終身处于襁褓之中，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經過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們都成了襁褓儿，那末誰来包扎我們呢？如果我們都躺在搖籃里，那末誰来搖我們呢？如果我們都成了囚犯，那末誰来做看守呢？

無論是单独的人或是群众中的一分子，生来都是不完善的。原则是沒有爭論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我們的辯論人的議論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議會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可見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說，其中沒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說，人根本沒有生存权利。

（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評論（第一篇論文）”，一八四二年。
“馬恩全集”第一卷第六〇——六一頁。）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必須采取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驟，往往是使工人組織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是怎样組織起来的，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这一步已經实现得比我們所能期待的迅速得多了，这是主要的一点。至于这个党的最初綱領还很紊乱，还很不能令人滿意，它打起了亨利·乔治的旗帜，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但也不过是暫时的缺点。群众一定有时間和机会来改进，只有在他們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时候——不論什么形式，只要他們自己的运动——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中，他們能由于自己的錯誤而有所进步从自己的經驗中取得教訓。

（恩格斯：“給左尔格的信”，一八八六年。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第一九三頁。）

在我們的工人自一八七八年起經受了光輝的考驗以后，我无条

件地相信他們，而且只相信他們。他們正象任何大黨一樣，不能避免犯個別的錯誤，甚至可能是大的錯誤。要知道，群眾只是從自己錯誤的後果中學習，從自身的感受取得經驗，但是這一切將得到克服，而且在我們這裡比任何別的地方都容易得到克服，因為我們的青年真正具有不可摧毀的健康。

（恩格斯：“給施米特的信”一八九〇年。“馬恩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四頁。）

當然，我們根本沒有想以這種缺乏鍛煉來責備當時的活動家們。但是，為了總結運動的經驗，並且從這個經驗中求得實際的教訓，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各種缺點的原因和意義。……只要任務提的正確，只要有不屈不撓地實現這些任務的毅力，那末暫時的失利就不過是一種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經驗和組織工作的靈活性，是可以學到的東西。只要有養成這些必要品質的願望就行！只要能夠認識自己的缺點就行，因為在革命事業中，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就等於改正了一大半！

（列寧：“怎麼辦？”，一九〇二年。“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三四五頁。）

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一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一點上，在相信德國“共和國”很快就成立這一點上（“誓為共和國而死”——恩格斯回怙他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期間參加爭取帝國憲法的戰役的情緒時這樣寫過），有很多錯誤，而且常常犯錯誤。他們一八七一年也犯了錯誤，他們當時一心一意想“把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他們（貝克爾寫的是“我們”，這是指他自己和他親密友人而言，見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第十四封信）為此而犧牲了人所能犧牲的一切，冒了一個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險……。”在同一封信里寫道：“如果我們在三、四兩月間可以多籌集一些錢，我們也許就能把整個法國南部發動起來，把巴黎公社挽救過來。”（第二十

九頁）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經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階級的水平，使他們超出日常細小的任务範圍的两个偉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錯誤，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說革命是无謂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場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較起来，要高尙千倍，偉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貴千倍，正确千倍……

（列宁：“約·菲·貝尔克等致弗·阿·左尔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一九〇七年。“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六二頁。）

讓卖身投靠資產階級的报刊大声喊叫我們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錯誤吧。我們不怕有錯誤。人們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劳动階級多少世紀一直受压迫，受折磨，处于貧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們进行革命是不会不犯錯誤的。而資產階級社会的死尸，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們中間腐烂发臭，敗坏空气，毒化我們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圍新鮮的、年輕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維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声喊叫我們犯了錯誤，在一百个錯誤后面就有一万个偉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隱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間的，是由不习惯（也沒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績的人們做出来的，因此，这些行动显得更加偉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們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錯誤，我們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偉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設新生活，用自己的經驗来解决社会主义組織的最困难的問題。

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們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錯誤都抵得上剝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沒有錯誤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錯誤，才能学会建設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資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給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列宁：“給美国工人的信”，一九一八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五三、五四頁。）

当新事物剛剛誕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內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的幼芽軟弱，抱着輕浮的知識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們应当縝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細地对待它們，尽力帮助它們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們战胜梅毒，耐心地試驗了六〇五种藥品，直到制出滿足一定要求的第六〇六种藥品为止，可見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們，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試驗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

（列宁：“偉大的創举”，一九一九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八七頁。）

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現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許我們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說，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已經有了这种发明。縱然头一架蒸汽机从

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苦吃，就让它宣传去吧，反正世界上所有的工人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弄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还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二六七页）

……我们的困难不是衰落中的困难或停滞中的困难，而是增长中的困难，高涨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根本不同。在美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难，因为美国现在正经受着危机即经济衰落。在英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停滞中的困难，因为英国已经有好几年处于停滞状态，即停止向前发展。而当我们谈到我国的困难的时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发展中的停滞，而是我国力量的增长，我国力量的加强，我们经济的前进。到某某时候前进多少，多制造出百分之几的产品，多播种几万公顷的土地，提前几个月建成工厂、筑好铁路，——这就是我国当人们谈到困难时所指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困难和美国或英国等国的困难不同，我们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们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们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们本身就给我们造成克服它们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六頁)

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踪。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三——二四頁)

廣大幹部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他們的這種積極性，要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中不但有偉大的成績，也有一些缺點。在一個新的、象人民公社這樣的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会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卻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地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地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会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就不過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所常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二月鄭州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必須坚决反对对新生事物的悲观主义

为了爭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国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八年的，德国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的空前的斗争么？在复辟了的帝制自以为比前此更加巩固的那一瞬間，不就是中等階級胜利最密邇的时候么？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之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騷动的地方，必有一种社会要求为背景，这种要求为陈旧的制度所阻撓，不能得到滿足。这种要求也許还未被人民普遍地强烈地感觉到，足以保証立即得到胜利，但一切用暴力压迫它的企图，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枷鎖为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八五一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頁。）

最后的胜利是不成問題的，不过現在走弯路以及发生暂时和局部的迷茫（虽然这本来也是难免的）的可能将比以前多得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們應該克服它們，而且我們就是为克服它們而生的。正因为如此，我們永远不会丧失勇气。

（恩格斯：“給左尔格的信”，一八八三年。“回忆馬克思、恩格斯”第四〇二頁。）

其实，任何人只要多少能够从历史上来观察事物，就一分鐘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紊乱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到新的过渡状态，是新事物不断成长的状态。

（列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一九一八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一九二頁。）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現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这样看法的同志們）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實質上看，便大

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說，現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他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經得了充分的証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〇五頁。）

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們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敗。这种說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国燾）：中央紅軍失敗了。这話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馬克思主义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还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只一个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們說，紅軍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来是失敗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計劃的方面）說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来是失敗了。这样說才是恰当的，因为我們完成了长征。

講到长征，請問有什么意义呢？我們說，长征是历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書，长征是宣傳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經有过我們这样的长征嗎？十二个月光阴中間，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偵察轟炸，地下几十万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尽的艰难險阻，我們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驅两万余里，縱橫十一个省。請問历史上曾有过我們这样的长